

工部太堂
鑾閣學部堂

廿二年三月

中國民族政策研究 A STUDY ON THE ETHNIC POLICIES OF CHINA
[日] 松本真澄 著
魯忠慧 译
1945 年 中心
以清末民族至論為中心



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

——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

ZHONGGUO MINZU ZHENGCE ZHI YANJIU

[日] 松本真澄 著
鲁忠慧 译

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序章 本书目的与理论框架 (1)

一、问题之所在 (1)

 1. 国民、nation(民族)、国民国家、国家间的统一 (1)

 2. 中国的两个“民族”概念 (2)

二、历来的研究倾向与问题 (4)

 1. 对1949年以前历史的评价与时代背景 (4)

 2. “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内涵 (6)

 3. 中国国内的研究 (10)

 4. 欧美的研究 (11)

 5. 日本的研究 (14)

 6. 对历来研究方法的评判 (16)

三、本书的理论框架 (18)

 1. (认同感) identity与ethnicity论 (18)

 2. 复合(认同感) identity与ethnicity论 (21)

四、本书概要与使用的资料 (25)

第一章 清末民族论的概况 (32)

一、君主立宪派、革命派登场之前的“灭满兴汉”的系谱 (33)

 1. 清朝中期的社会变动与诸矛盾的显现 (33)

 2. “灭满兴汉”的萌芽 (34)

 3. 中日甲午战争与对“中国”认识的诞生 (38)

二、救亡思想的诞生——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论	(40)
1. 严复达尔文主义——“亡国灭种”危机观的诞生	(40)
2. 梁启超与种族观	(43)
3. 康有为与“大同”中的种族观	(44)
4. 日本的“民族”论及其影响	(46)
5. 种族意识的高涨与君主立宪派	(47)
三、革命派排他的种族主义的勃兴——黄帝的“子孙”	
“汉族”一体化	(48)
1. 章炳麟的排满主义	(48)
2. 邹容的种族论	(51)
3. 陈天华的种族、宗族一体论	(54)
四、辛亥革命以前孙文等革命派的民族论	(56)
1. 孙文的种族论、民族概念	(56)
2.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中所论述到的中国同盟会 之民族论	(60)
3. 从复仇排满向同化论的转变	(64)
4. 《民报》时期章炳麟的民族思想之变化	(65)
第二章 中华民国时期之民族论与民族政策	(74)
一、围绕五族共和论的诸问题	(75)
1. 五族共和论的诞生	(75)
2. 五族共和论与周边 ethnic 群体的反应	(77)
3. 孙文与五族共和论	(79)
4. 袁世凯等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	(84)
二、“五四”运动以后的孙文与“民族主义”	(87)
1. “五四”运动与新世界主义的诞生	(87)
2. 向作为对内对外中国民族主义的同化论	

——五族共和论的诀别	(89)
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期，围绕“民族自决、自治论”的各种问题.....	(97)
1. 围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民族问题”的先行研究	(97)
2. 孙文的“自决”、“自治”	(102)
3. 苏联外交与广州政府	(112)
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民族问题”	(115)
5. “联邦制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与“统一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	(115)
6.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再解释	(121)
四、孙文之后民国时期的民族论.....	(124)
1. 消失的“弱小民族的自决、自治权”与国民党的中国统一	(124)
2. 作为黄帝子孙的中华民族与西北的发现	(127)
3. 《禹贡半月刊》与“国族”的形成	(131)
4. 齐思和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解释	(133)
5. 顾颉刚对回回的再评价	(136)
6. 此后的国民党之民族论	(138)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与民族政策 (1922—1937)	(156)
一、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 ethnic 群体的动向	(158)
1.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民族论	(158)
2.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民族论、民族政策	(159)

3. 国共对立与民族论的变迁	(165)
4. “满洲国”的“民族协和”与中国共产党的论驳	(176)
5. 对内蒙自治运动的评价	(182)
二、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转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萌芽	(186)
1. 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向与民族自决原则	(186)
2. 为了抗日的“民族自决”	(194)
3. 中华民族概念的导入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分歧	(201)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与民族政策 (1937—1945)	(222)
一、民族独立论的否定与新“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	(222)
1. 对中华民国正统性的认定与“自治”的内容	(222)
2.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与新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	(224)
3. 孙文正统的后继者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 的诞生 (1940年)	(232)
二、新民主主义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诞生：在陕甘 宁边区的实践	(235)
1. 西北工作委员会	(235)
2. 民族区域自治的诞生	(238)
3.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情况	(243)
4. 《论联合政府》中的“民族自决论”	(249)
第五章 中国伊斯兰改革运动与中国国家	(265)

一、“回回”的内涵	(266)
二、清末危机与中国伊斯兰改革运动的萌芽	(267)
1. 改革运动前夜的时代背景	(267)
2. 留东清真教育会	(270)
三、中国伊斯兰改革运动与宗教领导者	(274)
1. 伊赫瓦尼派	(275)
2. 王浩然阿訇	(277)
3. 成大师范学校	(280)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与宗教 领导者	(284)
1. 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与阿訇	(284)
2.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与阿訇	(288)
五、延安时期的回族民族理论政策与中国伊斯兰改革运动	(290)

序章 本书目的与理论框架

一、问题之所在

1. 国民、nation（民族）、国民国家、国家间的统一
冷战结束后，“民族纷争”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发生的情况，促使学术论坛上，展开了有关“国民国家”、nation state 究竟是什么，民族、国民、nation 的原意又是什么的热烈讨论。讨论的出发点是自二战结束以后到 1989 年的这一时段内，我们一直深信着的主权国家的框架，实质上是否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呢？随着国际间相互依存的加深，绝对的主权降低的同时，“国民国家”的“黄昏”和“摇曳”也在悄然逼近。^①

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的加盟国家数急剧增加，至 1998 年，联合国的国家数已超过 190 个，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由此可见，国民国家还是支撑国际社会框架的牢固的单位。新生的国民国家几乎都是从原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分离、独立出来的，这些新生的国民国家与 70 年代以前从宗主国独立出来的殖民地国家迥然不同。由于地区间的、国家间的统合的不断发展，经济、政治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人力资源方面交流的频繁化，都已经成为超越了国界的 NGO 活动，

从而成为 20 世纪末推动世界的新潮流，此潮流与主权国家两者之间的增加并不存在丝毫矛盾，这就是现代国际社会的现状。国民国家的形成，对居住于某一地区、还没有自己独立政体的某些人类集团来说，政治上的凝聚、国民国家的形成，是其努力的方向，也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有魅力的实现目标。

2. 中国的两个“民族”概念

中国是拥有 12 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在国际社会细分化、复杂化的国民国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表明，中国现有 56 个民族。从分裂到统合，再分裂、再统合的国际趋势来看，中国采用了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国家制度，而分裂的危险性却并不十分显著，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例。这个统一的大国，1997 年 7 月 1 日恢复了对香港的主权，1999 年又迎来了澳门的回归，可以说这是 20 世纪里尽善尽美的事情了。

本书就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统一国家的民族观、民族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作为“民族政策”的区域自治论的起源问题，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探讨。具体地说，就是论述中国历史上自清末到抗战结束的 1945 年之间的“民族”观、“民族”论和“民族政策”是怎样一个变迁过程。通过此探讨，笔者以为是否可以寻找到一条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性的根据呢？

“民族”一词，汉语中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西欧语系中的“国民”（nation）、“市民”（citizen/citoyen）、担负着国家主权的人。具体而言，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华民族”。此时的“民族”可以置换为“公民”或“人民”。二是指少数民族。比如，说到“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团结”、“民族法”、“民族干部”等字样时，就

是少数民族之意。

国家的主权者与 subgroup（次群体）为什么用相同的“民族”字眼来表述呢？笔者的研究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另外，中国的“民族”一词还有政治上的意义。20世纪初的一个国家的两种名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哪一个国名，都共有着“中华”、“民”、“国”这三个概念，两个称国名主权的拥有者为“中华民族”。然而，20世纪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这两大政党所用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实际意义方面，虽有相同之处，但还是有着若干的差别。两大政党所用“中华民族”概念的不同在于国民党认为的“中华民族”是汉化为汉人的全体。中国共产党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是在承认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的存在和多元性的基础上，将其集合体称之为“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的所有人，这一点上，两者是共同的。

所谓“民族”地位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某一“少数民族”一旦获得“民族”地位，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具有了将民族代表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起到一定的政治作用。

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现存的重要的中国“民族”观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被解释的，同时又赋予它怎样的意义，并对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进行分析。可以说，本书是想以解读“民族”这一关键词语为纵线，透视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一种尝试。

二、历来的研究倾向与问题

1. 对 1949 年以前历史的评价与时代背景

首先回顾一下有关对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历来的研究方法，然后再来回顾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

二战以后，日本、欧美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的方法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迁。笔者以为，这种变迁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1949 年——1966 年。第二个时期为 1966 年——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第四个时期为 1989 年——1998 年的现在。

第一个时期的特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人民的胜利，作为 50 年代——60 年代蓬勃发展的亚非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先驱并取得光辉业绩的典范，受到了颂扬。与此相互应，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以前的历史，被看做迈向革命胜利的“光辉光荣的历程”，这是持肯定态度者的研究观点。因此，对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基调在当时的反映，一般来说，对中华民国、国民党的评价都比较低。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持批评意见，但没有引起一般研究者的兴趣。

第二个时期的特征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论争。“文化大革命”是是非非”的论争，在中国研究者中间，在持肯定与否定的两派之间留下了鸿沟。但是“文化大革命”派与非“文化大

革命”派却有着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两派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制高点，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轨迹是走向革命的光辉足迹。除了只是对孙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外，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史给予了相对较低的评价，两派在此方面与第一时期的理论是一致的。有关民族政策，有一部分研究者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但关键性的论据不足。

第三个时期的特征就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中国情况和形势，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各种问题的倾向性。历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存续是光辉革命的成果”的这一视角受到了挑战。研究者开始从中日战争、中苏论争、毛泽东参与朝鲜战争的决策、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中越纷争、少数民族的统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西藏、新疆等分离主义问题等方面，进行着多视角的研究。这些研究与第一、第二个时期的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有关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研究，以上述的视角为原点，同样是持批评与否定的论调。就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体制，除了给予孙文很高的评价外，只有一部分研究者进行着研究，而且不甚深入。

第四个时期的特征是试图针对 20 世纪现象的“中国”这样的国民国家的本质，进行再探讨。也就是说，许多研究者意欲研究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及不管原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而继续坚持实行社会主义，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增长而且于 1997 年顺利收回了香港，21 世纪继续强化着国民的统一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初次试图问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在建设统一的国民国家这一共通点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对 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历史评价，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第三个时期以前的特征是用西欧式的民主主义的尺度衡量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体制的是非，用意识形态的不同讨论 1949 年

以前历史的倾向十分明显。对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以前的“革命”评价，在这不足 50 年的时间中，从“绝对善”转向了相对化，90 年代的以后，是中国奏响建设国民国家这一前奏曲的时代。国民国家的创建与建设作为 20 世纪世界现象的一环，非常有必要认识 1949 年以前的历史。

2. “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内涵

第四个时期，“国民国家”成立的绝对条件——“领土”、“人民”、“政府”成为了热点讨论的问题，笔者提出的这一问题与绝对条件的前两项有关联。为什么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统治如此广大的领土，其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居住于如此广大领土上，在宗教、语言、习惯等方面各异的各种各样的人们，却因持有中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样一个相同的理念而凝结为“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此问题浩渺而庞大，显然仅仅依靠笔者一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但是，笔者在阅读、寻找各种文献资料期间，发现汉人认识的“中国”、“中华之地”范围随着时代变化的同时，自我意识的范围也在发生着改变，由此，笔者似乎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口。

例如被称为“中华民国”之父的孙文，其“中国”观、“民族”观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他最初的革命目的是驱逐“满”，依靠“汉人”恢复汉之土地即对中国本部（十八省）的主权的恢复。他在革命前，以恢复汉族 = 中华民族的权利为目标的同时，几乎没有提及旧藩部之民的处境待遇的问题。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际，他认为的“中国”范围扩大到了包括“汉、满、蒙、回、藏之土地”，民族论变为了“五族共和论”，接着又变成了同化汉人以外四族为汉人的“同化论”、“单一民族论”，晚年时，又成了“弱小民族自决、自治论”。有关这些民族论的解释，本书的第二章将加以详述。孙文内心不断

发生摇摆的“民族”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中国”、“中国人”指的什么，应该是什么，理应同时问津。

由孙文提出的这个课题，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必须面对。因为使边境之民如何参加到新国家中的问题是其国家的根本，具体而言，是关系到加入国际性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体系时，中国国家的主权领域所具有的正统性的大问题。

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认识又如何呢？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后不久，就有了采用苏联联邦制的初步计划。此时中国共产党所认为的十八省的中国本部就是“汉”无产阶级民族=中华民族之地。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都是无产阶级这一共通点，汉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蒙古族能由 inter-nationalism 连带起来，在建立了各自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就能采用苏联的联邦制。但是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之时，中国共产党认为的“中国”与国民党主张的一致了，就是认为“中国”包括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土地”，“中国人”、“中华民族”不仅包括汉无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华民国主权范围内的即除了“民族的背叛者”之外的、居住在“五族之地”内的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所指的“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范围随着时代背景的推移而扩大化。

但是，回顾历来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中国人”、“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中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样的词语，在无意识之间，与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及相应的“汉族民族主义（nationalism）”被一视同仁了。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推进者——孙文、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易帜于国民党的东北军阀张学良都是汉人。可是，在历来的研究中，言及“中华民族”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华民族”是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这一概念的研究者几乎没有。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从执政者汉族之处承袭过来的民族主义（nation-

alism) 和民族观。

俯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如果用现在的少数民族的分类法进行分类，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物，曾因自愿加入冠以“中国”之名的政党的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而活跃于中国舞台。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之重职的白崇禧，就是中国穆斯林。还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参加共产党的、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是土默特左旗的内蒙古人。这两位名人，都有着共同方向性，即与汉人一起建设冠以“中华”之名的统一国家。

所以，在研究中国的研究者与在现实中实行政治行为的人以及居住于当地的民众之间，对中国·中华的认识，无论是范围也罢、影响也罢，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包含西藏、新疆、内蒙古在内的广大的领土，特别是周边国家及地区并不一定安定。除了与印度等陆地连接的邻国的国境问题之外，与台湾作为势必统一的领土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同时留存着沿海诸岛问题、南沙诸岛问题这些未解决的领土问题。国内的西藏、新疆一部分分离主义运动继续存在着，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维持稳定，一方面在“提高爱国意识”上花了很多的精力。

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内大多数人的“中国”、“中华”与居住于边境的一部分人的“中国”、“中华”以及与主张所有权不能让渡的各种外国势力所认为的“中国”范围有分歧。

在现实中，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利用这一分歧的历史事件很多。毋庸置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其中一例。日本的傀儡国家、“满洲国”的建设实际上是将“满洲地方不是中国人 = 汉人的土地”、“满人的自立”此类理论正当化了。同样，傀儡政权、蒙疆政权的建立也是在“蒙古自决、民族复兴”这类口号下进行的。当然，这样的傀儡国家和傀儡政权的建立是对当地大多数民

众的自立和人权的践踏。与日本军部和与日本协力的极少数的当地人，钻营了汉人与“满系中国人”，“蒙系中国人”之间对“中国”认识上的不同的空隙，实行侵略，或者是与其合作，将其行为正当化而已。至少从中国一方来看，“蒙系中国人”的内蒙古王爷德王希望自己能去掉附于此词之后的“中国人”，成为具有独自的政治单位权利的“蒙古民族（Mongolia nation）。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中国内地的侵略政策就是分而治之，具体而言是使汉人和少数民族反目成仇，日本就可以利用其缝隙，将自己的军事占领、经济掠夺正当化。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党党员和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对“中国”·“中华”的防卫方面来说，“边境”和“少数民族”是军事上的重要要素，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促使这一认识深刻化了。

这个时期，“边境”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许多英雄事业的舞台。第一，中国共产党长征中经过的“西南山区、草地”，与那里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第二，长征结束以后，既是革命根据地又是抗日战争的前哨基地的陕甘宁边区，在一般人的意识当中，也属于“边境”。第三，陕甘宁边区，当时是国民党作为民族复兴运动象征的中华民族传说的始祖黄帝的故地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的地方。第四，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与日军展开“民族防卫战”的地方就是陕甘宁边区周边的“边境”。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入侵，就是从“边境”开始，一点一点地对汉人之地形成了包围之势的。

除了上例之外，还有一例就是当“满洲国”的建国在“边境”之一的东北进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国为何？”的疑问，这个疑问如大海之波涛迅速波及到了全中国，最终变成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边境之民和边境之地就是“中华”之民、中华之地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普

遍化了。

3. 中国国内的研究

针对“中国人为何？”“中国为何？”“中华民族为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答案就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翌年的西藏解放。由此而明确的“中国人”观、“中国”观、“中华民族”观及对分离主义的严密警戒都与国民党认识的“中国”印象有着极其的相似性。国民党强调的是“中国人 = 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 (homogeneous nation)”，“中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 (unitary nation – state)”，与此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人 = 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 (nationality) 构成的民族 (nation)”，“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unitary multi – nationality state)”。

在至今约 50 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学会一贯强调国民党的单一民族论是大汉族主义是不妥当的，并且一再证明“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中国历史的多元性”、“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中华民族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等主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区域自治论”是正确的。在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发表的有关“民族”的论文就有 1000 篇以上，这些论文发表的领域广泛，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到学会杂志、大学学报，但是在证明上述主题的正确性方面，无论那一个论文的论点都几乎是一样的。

1989 年中国民族学会的泰斗、世界文化人类学的学者费孝通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其主题就是“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构造”即“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②，这就代言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的定义，即 Benedict 主张的政府公定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论，至 1998 年几乎是所有论述者都采用